



西北第一民族學院  
上海古籍出版社  
法國國家圖書館

編纂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  
敦煌西夏文文獻

Fonds Pelliot Xixia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二〇〇七年·上海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西夏文文獻

編纂 西北第二民族學院

上海古籍出版社

法國國家圖書館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市瑞金二路272號

郵編 200020 傳真 (86-21) 64339287

網址 [www.guji.com.cn](http://www.guji.com.cn)

電子信箱 [guji1@guji.com.cn](mailto:guji1@guji.com.cn)

易文網 [www.e Wen.cc](http://www.e Wen.cc)

印刷 上海展強印刷有限公司

法國國家圖書館底片。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圖版權 © 法國國家圖書館

文本版權 © 西北第二民族學院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獻/西北第二民族學院,上海古籍出版社,  
法國國家圖書館編纂,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4

ISBN 978-7-5325-4683-1

I.法… II.①西…②上…③法… III.歷史—文獻—匯編—中國—西夏(1038~1227) IV.K246.3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7)第044746號

開本 787 × 1092mm 1/8

印張 二八·二五

插頁 五四

版次 二〇〇七年四月第一版

印次 二〇〇七年四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1-250

ISBN 978-7-5325-4683-1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西夏文文獻

主 編 李 偉（中國） 郭 恩（法國）

副主編 任維楨 楊 敏 束錫紅（中國）

蒙 曦（法國）

監 製 張春雨 王興康

學術顧問 聶鴻音

特約編輯 劉景雲

編輯委員會（按姓氏筆畫排列）

丁明俊 王立翔 王興康 任維楨 李 偉

李小寧 束錫紅 吳建偉 府憲展 張春雨

閔文義 楊 敏 雷崇民 趙 傑 劉景雲

責任編輯 府憲展

裝幀設計 嚴克勤

DOCUMENTS XIXIA DE DUNHUANG  
CONSERVÉS À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Fonds Pelliot Xixia

ÉDITÉS PAR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Institut supérieur numéro 2 d'étude des minorités du Nord-Ouest  
Les Éditions des Classiques chinois,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07.Shanghai

**RÉDACTEURS EN CHEF**

Li Wei (Chine)

Monique Cohen (France)

**RÉDACTEURS EN CHEF ADJOINTS**

Ren Weizhen Yang Min Shu Xihong (Chine)

Nathalie Monnet (France)

**DIRECTION**

Min Wenyi Wang Lixiang

**CONSEILLER**

Nie Hongyin

**RÉDACTEUR SPÉCIAL**

Liu Jingyun

**COMITÉ DE RÉDACTION**

Ding Mingjun Fu Xianzhan Lei Chongmin Li Wei  
Li Xiaoning Liu Jingyun Min Wenyi Ren Weizhen  
Shu Xihong Wang Lixiang Wang Xingkang Wu Jianwei  
Yang Min Zhang Chunyu Zhao jie

**RÉDACTEUR**

Fu Xianzhan

**COUVERTURE**

Yan Keqin

XIXIA DOCUMENTS FROM DUNHUANG  
IN THE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Fonds Pelliot Xixia

PARTICIPATING INSTITUTION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the Second Nor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07.Shanghai

**EDITORS IN CHIEF**

Li Wei (China)  
Monique Cohen (France)

**VICE EDITORS IN CHIEF**

Ren Weizhen Yang Min Shu Xihong (China)  
Nathalie Monnet (France)

**SUPERVISORS**

Min Wenyi Wang Lixiang

**CONSULTANT**

Nie Hongyin

**SPECIAL EDITOR**

Liu Jingyun

**EDITORS COMMISSION**

Ding Mingjun Fu Xianzhan Lei Chongmin Li Wei  
Li Xiaoning Liu Jingyun Min Wenyi Ren Weizhen  
Shu Xihong Wang Lixiang Wang Xingkang Wu Jianwei  
Yang Min Zhang Chunyu Zhao jie

**EDITOR IN CHARGE**

Fu Xianzhan

**COVER DESIGNER**

Yan Keqin



# 序言

李偉

## 一、西夏文的發現、研究和刊佈的簡單歷史

在繁盛一時的唐王朝（618-907）灰飛烟滅以後的一百年，原先活躍在川藏草原的党項羌族在中國西北地區崛起。公元1038年，元昊正式建國稱帝，國號大夏，世稱西夏。建都興慶府（後改名中興府，即今寧夏銀川市），轄今寧夏、甘肅大部，陝西北部，內蒙古西部和青海東部的廣大地區。西夏共歷十帝，享國一百九十年。前期與北宋、遼鼎立，後期與南宋、金對峙，在中國中古時期形成了複雜而微妙的新「三國」局面。

這是一個文化事業甚為發達的王朝。早在立國前夕，開國皇帝元昊命令野利仁榮創制了記錄党項族語言的民族文字，時稱爲「番字」、「番文」或「番書」，後世稱「西夏文」。自此在西夏全國同時通行西夏文和漢文。西夏王朝既注重党項族的傳統文化，又積極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特別是漢族文化和藏族文化；既提倡儒學，又弘揚佛教，用西夏文翻譯了數以千卷計的大藏經，建立了衆多的寺廟，創造了絢麗的藝術。但是，西夏王朝在正史中却只有簡略的記載，在二十世紀初西夏文物文獻資料大量發現之前，西夏始終是一個充滿神秘的王國，是一段撲朔迷離的歷史。

西夏文是流行於宋初到明代的西北党項民族的文字，到清代已經完全死亡，無人能够釋讀。對於西夏文的重新認識，最早始於十九世紀初，清朝著名西北史地學者張澍在武威發現西夏《重修涼州護國寺感應塔碑》，不僅使這一重要文物重光於世，也使久已死亡的西夏文開始又爲世人所知。十九世紀末，英、法學者考證北京居庸關過街塔門洞壁上六體文字是西夏文，花費了近二十年的時間。1908年，俄國科茲洛夫（1863-1935）探險隊在內蒙古黑水城遺址發掘到了西夏文寫本，受到俄國皇家地理學會的高度重視，認爲這是一種過去不甚了解、當時尚未解讀的神秘文字。科茲洛夫受命改變到別處探險的計劃，在1909年再次到黑水城繼續發掘尋找，在故城西面河岸邊「著名的」大塔發現了一個皇家的「地下圖書

館」。這次發現，被譽為和殷墟甲骨文、居延漢簡、敦煌遺書并稱的二十世紀初最為重大的考古發現，為西夏學和其他各項研究奠定了材料學的基礎，并形成泱泱大觀的嶄新學科。

在科茲洛夫後來的回憶錄中寫到：「曾從黑水城廢墟中運出四十駝，駱駝運出了一個保存完好的圖書館，計有二萬四千卷……；那麼就會明白那座著名的佛塔提供了多麼巨大的財富。」①

後來中國學者羅福苕著《西夏國書略說》，羅福成著《西夏譯蓮華經考釋》，進一步開展了專項研究。隨後的是王靜如《西夏研究》②三輯，涉及西夏語言、文字、文獻，考證功力尤深，是當時西夏研究的高水平成果，獲得了法國茹蓮獎。而陳寅恪先生《斯坦因 Khara-Khoto 所獲西夏文大般若經考》、《西夏文佛母大孔雀明王經夏梵藏漢合璧校釋序》③就是在王靜如先生對英國所藏文獻譯證研究基礎上，闡述了佛經譯夏為漢的浩繁艱難、以漢證夏的勤苦精誠，西夏文獻譯自吐蕃中原的不同來源、對譯和意譯的不同方法、西夏文流傳直至明代萬曆之後的資料綫索，等等。到八十年代以後，中國的西夏學蓬勃興起，出現了一批蜚聲國際的優秀學者，如黃振華、史金波、李範文、陳炳應、龔煌城等等。在此之前，日本西夏學者也有很大的突破，如西田龍雄的《西夏語的研究》④、《西夏文華嚴經》⑤等，也是西夏文研究的經典之作。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聯合編纂的《俄藏黑水城文獻》⑥自1996年開始出版以來，逐步公佈了全部俄藏材料，對整個西夏學的推動具有重大的意義。而西北第二民族學院和上海古籍出版社於2004年出版的《英藏黑水城文獻》⑦，寧夏社會科學院和中國國家圖書館編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2006年出版的《中國國家圖書館藏西夏文獻》，以及寧夏大學等單位編纂的《中國藏西夏文獻》則完成了其他主要的藏品。本書所收法國國家圖書館藏品，則是流失海外的最主要的敦煌西夏文藏品之一。自茲以往，已經發現的西夏文文獻大多即已發表，西夏學的研究隨着新材料的刊佈，必將出現一個鼎新的局面。

## 二、伯希和在敦煌考察情況

我們注意到，作為一個最優秀的漢學家和東方學家，伯希和對於西夏文的興趣和了解，是與國際東方學界完全同步，並且幾乎和科茲洛夫在黑水城首次找到西夏文文獻、寄呈給俄國地理學會同時。1908年2月，伯希和考察隊到達敦煌以後，對各民族的古文字包括西夏文發生了濃厚的興趣。

首先，伯希和敏感地調查了包括用西夏文刻畫題寫的題記：「我覺得，為了解釋這些古籍的歷史，惟有一名漢學家纔可能做到并挑選出和利用最佳榜題和伴同它們的游人題記，它們全部或幾乎全部是用漢文書寫。我已經向您講過西夏文和八思巴文的游人題記，這可能非常奇怪，但其數量不大。屬於第一類（西夏文）的可能有20餘方，屬於第二類的勉強只有10方左右，它們全部都無法利用了。此外還有藏文、回鶻文、以常用字書寫的蒙古文和少許的婆羅謎文

題記。」<sup>⑧</sup>

其次，伯希和非常準確地依據有無西夏文文字來判斷藏經洞封閉的年代。他在報告中說道：「第一個需要澄清的問題，便是該密室的大致年代的問題。在此問題上，不可能有任何懷疑。其漢文文書中的最後年號是宋代的最初幾個年號：太平興國（976-983）和至道（995-997）年間。此外，在整批藏經中，沒有任何一個西夏字。因此，該龕是於十一世紀上半葉封閉的，很可能是發生在1035年左右，在西夏人征服時代。人們亂無秩序地將漢文與藏文文書、絹畫、帷幔、小銅像和直至851年雕刻的大石碑堆積在一起。人們可能會試圖將成捆卷子散落開的混亂狀態也歸咎於對這次即將來臨的入侵之恐懼，但我覺得更應該從中看到中原文明在敦煌地區的衰落。這種文明在唐代時非常發達興旺，後來一直艱難地勉強維持到五代時期。」由此可見，伯希和在洞窟中搜索西夏文遍尋無計，纔得出了藏經洞封閉於西夏占領敦煌以前的結論。這個强有力的論斷至今仍是藏經洞斷代的最主要依據，雖然關於其封閉的原因可能不是因為西夏的占領。<sup>⑨</sup>

在藏經洞中未能找到西夏文之後，伯希和在完成各項工作的同時，開始在北區石窟繼續尋求古代民族文字包括西夏文的資料。當他攫取了藏經洞「近全部寫本的三分之一」之後，他寧可在北區石窟尋找和帶回了我們所見到的支離破碎的西夏文殘片，也不再眷戀藏經洞被留下的三分之二的哪怕那麼重要、完整、甚至璀璨光華的其他文獻，可見西夏文文獻哪怕是一些殘片，對於國際學術界是多麼地重要。

法國國家圖書館原登錄西夏文藏品為217件，後繼續查找出未編號的217件，以及伯希和1938年在中國購買的經摺裝《華嚴經》一件，木板寫本一件。共著錄了2106件文獻；對於西夏文材料，有百濟康義編目的未刊稿，大致包括《華嚴經》、《二十一種行》等等。國內學者一般都未見過，可能認為全是殘片也不甚留意。正因為如此，他們往往就忽略了文獻學、書籍史的一些最重要的材料。

### 三、法藏西夏文文獻和俄國、敦煌研究院收藏的關係

法國國家圖書館收藏的伯希和搜集的西夏文文獻，不能沿襲英國的收藏稱為「黑水城文獻」，因為按照記錄，伯希和1908年3月在莫高窟P.181號窟、即今敦煌研究院編號404號窟發現了西夏文的刻本和寫本。所以，這些材料天生地和1914年俄羅斯奧登堡考察隊所獲敦煌材料、和近年敦煌研究院北區清理所獲材料互為關聯；一般來說，和黑水城出土的即英國所存材料是完全不同的來源。

我們知道，1908年俄國科茲洛夫考察隊首先在內蒙古黑水城發掘了迄今為止最多數量、最為完整、最為重要的西夏文獻；然後，是英國斯坦因在同一地點得到了僅次於科茲洛夫的重大收穫。此後其他地點和時間中獲得的西夏文獻，都沒有能夠超出這兩次考古發現。1917年寧夏靈武發現的元代西夏文獻，現存於中國國家圖書館，<sup>⑩</sup>少量則為日本藏家

收購；再以後在甘肅武威、寧夏銀川等各地，也都各有發現。但是，無論如何，伯希和在北區石窟發現的西夏文殘篇斷簡，是敦煌西夏文文獻較多發現的一次。

西夏文文獻資料的發現，一開始就表現出錯綜複雜的相互聯繫。明確材料的背景，明瞭其間的聯繫，對於考鏡源流、辨章學術是十分重要的。

關於1906年英國探險家斯坦因在敦煌的活動，我們從他的探險報告《西域考古記》（1928）已經大致瞭解。但是，我們似乎不知道他在北區石窟搜集到一些什麼。

此後是1908年法國探險家伯希和在北區石窟獲取西夏文資料的情況：伯希和在洞窟筆記中說道：「第181號洞：該洞部分地被廢物紙片堵塞。稍微清理一下就可以拍攝它們了。我們於那裏發現了用於印刷蒙古文（回鶻文）書籍的大量小方木塊，它們各自能印出一個完整的字來。那裏在元代可能於該洞中有一個印經廠。那裏也有漢文、藏文、婆羅謎文和回鶻文的殘卷，同時也有一些西夏文刊本斷篇殘書。這是一種新奇事。我讓人完成了對洞子的清理，大家於那裏最終發現了相當數量的印有西夏文的紙頁，它們至少屬於四部不同的書籍。一本幾乎是完整的回鶻文小冊子，寫有從中加入的漢文詞組短語，從而使人聯想到了我在第163號洞中於翻捆之外而發現的那個本子，我曾懷疑它是蒙古文而不是回鶻文的。如果它是蒙古文的，那麼它就應該是自1900年以來纔後放入第163號洞中的。這些書籍都已遭蟲蛀和被撕毀了。」<sup>⑩</sup>「第182號洞：在於第181號洞發現一些寫本殘卷之後，我令人清理了第182號洞的過庭。大家在那裏發現了相當多的漂亮藏文寫本殘卷，它們是被故意撕碎的，有時已被部分地燒毀。其中僅僅有二、三件刊本西夏文殘書。」<sup>⑪</sup>這就是伯希和獲取西夏文文獻的地點和環境情況。

以後是1914年俄羅斯奧登堡探險隊在莫高窟進行了發掘清理，涉及的範圍包括南區和北區。奧登堡探險隊在莫高窟北區確實進行了發掘清理，甚至鏟剝了遺留在今編D.B.T.窟西壁的影子背光。在哥薩克的照片中就有在北區洞窟清理積沙前的場景。推斷奧登堡探險隊所獲部分材料源於北區石窟，和現在在北區清理所獲材料有聯繫，確實是很有見地的<sup>⑫</sup>。但是，俄羅斯館藏却没有出自敦煌的西夏文特藏或者編號，而相反，一些出自黑水城的漢文文獻却混庠在了敦煌漢文文獻特藏中。由於俄國已經有科茲洛夫的黑水城特藏，由於科茲洛夫本人沒有對黑水城的發掘進行嚴格的記錄，由於俄藏黑水城藏品的海量和精彩，由於收藏過程中敦煌和黑水城文獻的可能混淆，我們對於參雜在敦煌特藏中的西夏時期的漢文文獻，只能根據內容和經驗來判斷是獲自敦煌還是獲自黑水城<sup>⑬</sup>。在《俄藏黑水城文獻》的編號序列中，雖然有「Дх」即「敦煌」縮寫的編號，但并非表示來自敦煌，而只是將錯編到敦煌漢文文獻序列的黑水城西夏文獻重新甄別出來，而沒有改變原先的編號。俄藏敦煌文獻序列中為什麼沒有莫高窟北區的西夏文文獻呢？為什麼就沒有像伯希和獲取的、敦煌研究院發掘採集的同類西夏文文獻的殘片呢？估計即使原先有西夏文文獻，因為文字屬性特徵十分明顯，也很自然地會在整

理、保管過程中被歸入到黑水城西夏文特藏中。

從2000年開始，敦煌研究院彭金章先生領導了對莫高窟北區窟群的發掘整理，在伯希和、奧登堡發掘之後繼續獲得了一些西夏文文獻。在考古報告中記載：「第五節第464窟：據有關資料揭示，1908年伯希和曾對此窟進行過挖掘，對此，他在《敦煌石窟筆記》中也作了記錄。掘獲的遺物有回鶻文木活字268枚，回鶻文文獻363件，西夏文文獻200餘件，此外還有漢文、藏文、蒙文、婆羅謎文文獻等。除此之外，1921年前後，滯留於莫高窟的沙俄殘部，亦曾對第464窟原西北側室瘞埋的元代公主墓進行了盜掘，盜掘所獲已不知下落。這兩次盜掘給該窟的考古發掘造成了無法挽回的損失。」<sup>⑮</sup>「第464窟中室和後室，……個別地方有少量細沙層，厚0.03米，在此層內僅發現回鶻文木活字2枚。此層少量堆積應為伯希和劫餘所留。……發現的遺物有漢文、西夏文、回鶻文、藏文、蒙文、梵文等文書殘頁、殘片，回鶻文木活字以及木構件花磚等。第464窟西北和東北側室彼此相通，故窟內堆積相同。……出土的遺物有漢文、西夏文、回鶻文、藏文文書殘頁、殘片以及陶燈、陶印模、木匙等遺物。」其中包括有西夏文文書28件。<sup>⑯</sup>

綜上所述，法國、俄國和敦煌研究院都先後在同一地點進行了發掘和搜集。首先是法國1908年，其次是俄國1914年，再後是2000年敦煌研究院開始歷經數年的全面清理，（1906年英國斯坦因似無記載。）這樣的歷史紀錄，也向我們揭示了法、俄、敦煌研究院藏品之間內在聯繫。同一地點的先後出土文物，其族群親緣關係對於橫向考察其相互聯繫、相互契合是十分重要的。尤其在我們已知其內容、形式所具備的共性的情況下，就尤其值得重視。——我們可以知道怎樣去尋求綴合，怎樣去利用所有的相關材料，怎樣去相互證明，等等。

#### 四、法藏西夏文文獻出版的意義

西夏文文獻的大規模集成性的出版，始於中國社會科學院、上海古籍出版社和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於1996年出版的《俄藏黑水城文獻》科茲洛夫收集品。2002年西北第二民族學院、上海古籍出版社和英國國家圖書館合作，出版了《英藏黑水城文獻》斯坦因收集品。2005-2006年寧夏社會科學院和中國國家圖書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中國國家圖書館藏西夏文獻》。雖然日本還有少量收藏，其主要為靈武出土的《華嚴經》等，和中國國家圖書館藏西夏文獻是同一來源。到此為止，流失海外的最後的最主要的藏品就只有法國伯希和搜集品尚未出版了。

前面已經說過，俄國、法國、敦煌研究院的西夏文藏品是同宗同源的。其相互的證明、參考作用是其他館藏無法替代的。所以出版法國藏西夏文文獻，首要的意義是把莫高窟北區和西夏文文獻收集完整了，形成科學研究的完整的材料基礎。

其次，法國藏西夏文文獻的學術價值也是十分值得重視的。從內容上來說，除有各種寫本、印本的佛經如《華嚴

經》、《二十一種行》和各種發願文外，有十分精彩的版畫作品，有社會文書等。關於管主八題記，法藏西夏文文獻中的例證更加清晰：「僧錄廣福大師管主八施大藏經於沙州文殊舍利塔寺永遠流通供養」<sup>①⑦</sup>。管主八「於江南浙西道杭州路大萬壽寺，雕刻河西大藏經板三千六百二十餘卷，《華嚴》諸經懺板，至大德六年完備。管主八欽此勝緣，印造三十餘藏，及《華嚴》大經、《梁皇寶懺》、《華嚴道場懺儀》各百餘部，《焰口施食儀軌》千有餘部，施於寧夏、永昌等寺院，永遠流通<sup>①⑧</sup>。」此次雕版，世稱「河西大藏經」，實物已見諸敦煌、永昌所出，法國此號為「河西大藏經」即西夏文大藏經的又一重要例證，體現了元代內地和沿海文化交流的重要信息，以及元代初期對西夏遺民的民族宗教政策。從書籍史來說，有寫本、雕版刻印本和木活字本等。其間幾十件木活字印本，特別是未曾公佈的一件文獻，顯露出活字底座的方角印痕，以及字行間嵌條的印痕，無可置疑地勾勒了西夏活字印本的一般特點。法國藏品和其他藏品一起，共同勾勒了世界最早的活字印刷術的歷史事實。

本書的出版，緣於法國國家圖書館、上海古籍出版社和西北第二民族學院的共同努力和鼎力合作。前者之間從1992年開始簽約編輯出版「伯希和搜集品中全部漢文和非漢文敦煌西域文獻」，已經取得了煌煌<sup>①⑨</sup>卷漢文《法藏敦煌西域文獻》的舉世矚目的成果；而後者之間從2004年開始合作，已經編纂出版了英國國家圖書館藏品的《英藏黑水城文獻》<sup>②①</sup>卷中的泰半，以及驚世駭俗的《大麥地岩畫》<sup>②②</sup>卷。地處古代西夏王國都城的西北第二民族學院，以繁榮民族歷史文化教育和科研為己任，既敢於開風氣之先，率先進行西夏文獻的大規模結集出版，又負重行遠，以完成《法藏西夏文文獻》而畢善其功。至此，英、法所藏西夏文文獻得以整理結集、編纂出版形式回歸故里，嘉惠學林，加上此前俄羅斯藏品的出版，流失海外將近百年的西夏文文獻十之八九已經重光於世，賀蘭黃河有靈，亦當為之擊節讚嘆。

本書作為海外收藏西夏文獻的圓滿結集，得到了國家民委、自治區領導的熱情支持。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聶鴻音先生、敦煌研究院樊錦詩院長和著名攝影師吳健先生、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柴劍虹秘書長、上海古籍出版社王興康社長等，以及北京、寧夏和上海等地的專家和朋友，為本書內容的研究釋讀、資料圖片的提供和協調指導，都提供了赤忱熱情的幫助。法國國家圖書館文獻部主任郭恩女士和中國寫本部主任蒙曦女士，都為此書竭盡心力。特別是劉景雲先生對全部西夏文獻逐一進行了考訂，標出了絕大部分西夏文獻的出處，甚至找到了許多殘片的原文，其功尤著。謹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謝！

二〇〇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 ① 地理學會檔案。轉引自《俄藏黑水城文獻》克恰諾夫《序言》，12頁。
- ② 王靜如著：《西夏研究》第一輯至第三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甲種之十至十三。1933年，北平。
- ③ 陳寅恪：原著於1930年、1932年《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貳本，復載於《金明館叢稿二編》187、198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10月。
- ④ 西田龍雄著：《西夏語の研究・西夏語の再構成と西夏文字の解讀》I, II。1964年—1966年。
- ⑤ 西田龍雄著：《西夏文華嚴經》III，京都大學文學部，1977年。
- ⑥ 《俄藏黑水城文獻》，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自1996年12月開始出版，至今已經出版漢文部分全部1—6冊，西夏文世俗部分7—11冊，並將繼續完成西夏文世俗部分其他分冊和西夏文佛教文獻部分。
- ⑦ 《英藏黑水城文獻》，英國國家圖書館、西北第二民族學院、上海古籍出版社編纂，已經出版1—4卷。
- ⑧ 伯希和：《敦煌藏經洞訪書記》，載《伯希和西域探險記》，耿昇譯。雲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10月第一版。P.257。
- ⑨ 榮新江：《藏經洞的性質及其封閉原因》，《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二輯。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六年，P.23—48。
- ⑩ 伯希和購買西夏文《華嚴經》Chinois 10065，其材料當和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為同一來源。
- ⑪ 伯希和：《伯希和敦煌石窟筆記》，耿昇、唐健賓譯。甘肅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第一版。P.383。
- ⑫ 伯希和：《伯希和敦煌石窟筆記》，耿昇、唐健賓譯。甘肅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第一版。P.390。
- ⑬ 沙武田：《俄藏敦煌藝術品與莫高窟北區洞窟關係蠡測》，載於《敦煌學輯刊》2004年2期，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
- ⑭ 《俄藏敦煌文獻》第五冊彩色圖版中集中刊登了俄方由於某種原因編入敦煌「IX」序列的黑水城或者北宋的文獻。榮新江：《海外敦煌吐魯番文獻知見錄》，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 ⑮ 彭金章、王建軍主編，敦煌研究院編：《敦煌莫高窟北區石窟》（第三卷），文物出版社，2004年，北京。P.53—54。
- ⑯ 彭金章、王建軍主編，敦煌研究院編：《敦煌莫高窟北區石窟》（第三卷），文物出版社，2004年，北京。
- ⑰ 史金波、雅森·吾守爾《中國活字印刷術的發明和早期傳播——西夏和回鶻活字印刷術研究》談到類似題記，但錄文不同。題記可參見 The gest library journal, volume III. numbers 1-2, spring 1989, P.24. 「宣授松江府僧錄管主八謹施」，還見於莫高窟北區的西夏文佛經殘頁《龍樹菩薩為禪陀迦王說法要偈》，以及日本天理圖書館佛經殘片。
- ⑱ 積砂藏《大宗地玄文本論》卷三發願文。日本善福寺藏本和山西太原崇善寺藏本文字略有不同。





# Preface

*by Li Wei*

## **1. A brief history of the discovery, research and publication of Tangut scripts**

One century after the destruction of the flourishing Tang dynasty (618-907), in northwest China there raised a tribe of Tanguts, which used to operate on the Sichuan-Tibet grasslands. In the year of 1038, Yuanhao made himself emperor and founded a state named Great Xia, which was known as Xixia by historians. The Xixia state, taking Xingqing Prefecture (or Zhongxing Prefecture later, now Yinchuan City of Ningxia Hui Autonomous Region) as its capital, had a vast territory of Ningxia, Gansu, northern Shaanxi, western Inner-Mongolia and eastern Qinghai. The state was governed by ten emperors successively and lasted 190 years in sum. It stood tripartited among Northern Song and Liao dynasties in its early period and among Southern Song and Jin in its late one, thus in ancient China there formed a complicate and delicate aspect of “New Three Kingdoms” .

Culture undertaking was well-developed in this state. Early before the establishment of Xixia, its founder, the emperor Yuanhao ordered Yeli Renrong to formulate a set of scripts presenting Tangut language, which was called “Barbarian Script” at that time and “Xixia Script” or “Tangut Script” in later ages. From then on, Tangut and Chinese script were current simultaneously in the state. The Xixia court invented a kind of splendid arts by laying stress on both the traditional Tangut culture and culture from other nationalities, especially those from China and Tibet. The court advocated both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translating thousands of sūtras into Tangut and established lots of monasteries. But until large amount of Xixia culture relics and writing materials were discovered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Xixia used to have been a mysterious Kingdom with a confusing history, for it was stated too briefly in Chinese official chronicles.